

研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话语群—行为”模式

——评《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

庄家炽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主要对《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中作者用“话语群—行为”模式对古村历史和现代变迁的手法和内容, 进行比较详细的解析。目的在于把“话语群—行为”模式分析社会变迁的方法进行现实操作。

关键词: 话语群; 行为; 社会变迁

无论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真正学术意义上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 还是 20 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人口状况和经济发展等角度研究农村社会变迁问题是学术界比较常见的现象。但大多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去解释农村变迁问题, 由此最终形成以典型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区分法的农村模式极为盛行。但是面对社会的转型和变迁, 传统的研究模型只能描述社会变迁的一般现象, 在深入解释社会变迁问题, 把握社会变迁发展的时间脉络和关键环节上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最可怕的是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民在变迁过程中, 正逐渐以另一种方式被研究边缘化。在此背景下, 作者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 做出了用“话语群—行为”的模式研究农村社会变迁的实验。试图通过对话语群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变化研究社会变迁, 探究微观层面上社会变迁、话语群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作用的方式以及变迁的规则, 寻找解释古村社会变迁更有效的研究方法。

一、古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框架介绍

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古村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一个有着 1400 人口的省级贫困村寨, 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十分复杂。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由于政府政策的关注, 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 它既是一个古村又是一个正发生着变化走向现代化的农村, 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社会变迁史保存完整的中西部农村的缩影。

研究假设: 一是古村存在着历史话语和现实话语两种话语体系; 二是历史话语和历史行为体系对现代人的行为和话语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历史话语、现代话语和行为共同影响着古村的社会变迁; 四是话语和行为之间一定存在联系。

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采取参与式观察的方法, 重点关注话语、行为和变迁三者古村上的关系反映, 贯穿从古到今的纵向时间轴, 深入挖掘的连续性研究方法。

二、“话语群—行为”模式

在了解了古村社会变迁的研究背景和主要梗概的基

础上, 笔者将重点谈一下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也是本报告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话语群—行为”模式部分。笔者主要从“话语群—行为”模式的介绍、选择此模式的原因、“话语群—行为”模式与古村社会变迁三大部分展开该部分。

(一)“话语群—行为”模式概览

话语群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种人们在行为中通过口头、书面上及其他形式表达和运用中的语汇系统, 有与他们的行为相关联的一套语汇系统。其中词汇系统包括思想方面的表达、技术性的政策、制度方面的表达和民间的口头表达等。话语群的特点在于以纵向的结构不断稳定的向前发展的词汇系统。话语群针对的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上围绕某种行为而聚集起一系列的话语群落, 这些话语群落在民间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交谈语言, 在政府及相应管理组织中表现为文件、工作报告、法律法规政策等, 在学术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学科及其研究结论, 在文化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当这些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围绕某个行为聚集在一起时,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有着核心话语的话语群落, 我们称之为话语群。^{[1](P.10-11)}

不同的话语群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 而本文所指的行为主要是社会行为。它是与个人行为相对而言的。个人行为千差万别, 但多个个人行为有某种一致性或相同倾向, 就构成社会行为, 它这并不代表社会行为的全部。因为, 有些行为从人数特征上来看, 属于个人行为, 但它以社会的名义表达出来的, 可视为社会行为。^{[1](P.13)} 比如村干部个人, 号召村民执行相关的上级决议。虽然村干部从数量上讲是个人, 但是由于其是以政府的名义活动的, 所以该行为也属于社会行为。

“话语群—行为”模式从内部和外部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 内部主要是说农村是由历史和现实组成的社会, 各种利益通过政策和法律制度进行表达, 形成一个多方互动的体系, 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或者其他。外部主要是一个庞大繁杂的话语体系, 包括法律、政策、学术理论、艺术语言、个人语言甚至社会怨言等。

收稿日期: 2010-03-13

作者简介: 庄家炽(1988-),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研究方向: 社会学。

作者把话语体系看成是历史过程的本身,将村落变迁放到“话语群—行为”模式中进行研究,以达到研究农村变迁真相和建构“话语群—行为”理论的目的。

(二)“话语群—行为”模式与古村社会变迁

1. 古村历史性“话语群—行为”模式与社会变迁

第一,田氏族谱、廪歌与天王庙的历史性话语群。经过对古村历史的研究,发现古村存在两条完整的话语群线索和一个历史话语群的化石。两条完整的话语群线索分别为田氏族谱和廪歌,一个历史话语群的化石则为天王庙。田氏族谱保存了关于田氏族源话语和不断修改族谱的痕迹,是一部关于田氏家族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的历史族谱。廪歌是与丧葬联系在一起的歌曲,共分为七部分反映了丧葬不同阶段的活动。但是廪歌除了表明上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是一部记录廪卡人迁移与隐居,以及在民族战争中如何与各民族交融和混战的史诗。天王庙则是见证和证实这些传说的实物,以自身留给后人思考民族历史和话语变迁的问题。

田氏族谱所体现的话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田氏族谱,古村人对历史的细节和事件记得十分清楚,古村人对细节和事件描述的增多,增加了古村人的历史话语。二是由于田氏族谱不断的修改,导致核心话语置换现象发生。为了躲避战争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族人在修谱时改变了本来的历史真相,让历史以虚假的方式出现。后世修谱时不去考证,遵循已有的族谱。这样就导致了核心话语位置的转移,那么就导致历史话语群不是一个完整的话语群,而只是话语群局部的一个反映。廪歌作为一个话语线索,则主要是与核心话语转换的产生有关。由于对廪歌记载的内容缺乏科学的认识,只把它视为丧葬的歌曲,只关心其中部分传说。尤其是对白帝天王的关注,使古村人遗忘了历史的话语。在新的历史不断冲击下的历史,逐渐被新的族源话语所解构,导致古村人对身份也遗忘了,发生了古村人身份的转变。

第二,历史性“话语群—行为”模式与社会变迁。话语体系和行为体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在稳定的环境中存在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由于两者的变化导致社会变迁的发生。历史上古村“话语群—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转型或者自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会导致人类的某种行为的消失,在这个消失的过程中,引起相应的话语体系因失去某种行为依托的话语快速释放。而这些话语曾经被吸引在核心话语周围,产生一种向内部的力量。但现在各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话语释放的速度越快,平衡被打破的也越快,行为发生的变化就越大,社会变迁就越严重。二是导致话语体系中“死话语”的出现。所谓死话语是指在回忆话语体系中,部分语言话语作为语言潜伏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而面临死亡。而面临死亡的这部分话语就是死话语。在古村的死话语下存在两种行为模式,一方面,死话语以“前见”的形式保留下来,就是说前见以先入为主的思想影响个体的行为。从而对个体的行为产生结构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回忆话语,成为当事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前见影响下的话语结构,是比较危险且非常保密的部分,也是少数民族保护自己文化最坚强的部分。在历史的话语体系中,话语以多样的方式解构着个体的行为。

2. 古村现代“话语群—行为”模式与社会变迁

第一,古村现代话语群及行为。政治权力、经济一体

化和新兴话语的介入,正以迅速并有效的方式切入到古村的社会生活中,而这些正逐步的瓦解着古村的历史话语体系。这些以新元素的方式汇聚新的力量,建构新的话语体系。

组织性话语群主要表现在宗族、民间信仰与秘密结社。以妻子血缘关系较近的亲族关系和以丈夫血缘关系较近的家族关系,是古代社会交往中十分重要的两大支持系统。也是古代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主要框架。但是在现代由于政治法律和经济结构的原因,原始的宗族在不断的被瓦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尽管如此,宗族也在以“以退为进”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占据着自己特殊的位置。民间信仰是古村最大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是多层次的行为体系。而且这个话语体系比较容易的地将古村人团结在这个民间信仰的体系内,在信仰话语的基础上形成组织话语。组织话语将古村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建构组织话语群。

第二,当代“话语群—行为”模式与社会变迁。在当代古村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变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实务的发展变化。纵览本书发现,对公益事业的态度和行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情况和参观行为对描述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古村实施公益事业的行为中,谁受益,谁出钱是古村公益行为产生的指导性标语。修学校和修电网等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益活动,是古村人活动的主要指向目标。古村人行为的主要表现为出钱和出力。而社会安全和社会卫生事业对古村人则不具备应有的行为号召力。所属民族是古村人身份的一种表现,各自以自己喜欢或者有权威的身份为自己的身份。参观话语群主要是政府以三种方式影响人们话语群的建构。

三、对“话语群—行为”模式视角的思考

第一,除从话语群视角描述社会内部变化带动社会变迁外,要增加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和机制的话语群研究。李培林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工具的改进、新植物品种的引进、耕作方法的改善是农村变革与变迁的力量。向安强、黄进强等指出,环境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与受其他民族影响而发生变化是农村以及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2]。笔者认为,本书作者从话语群的视角比较详细的分析了农村的社会变迁。但是分析着重于生活现象本身的变迁,对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和机制没有进行话语群的分析 and 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话语群对农村社会变迁的解释力。

第二,“话语群—行为”模式解读制度和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大师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是在社会制度中提供凝聚力的构成特性,这种构成特性可以当作规则和资源来理解;他们在社会制度的复制中被反复涉及,结构采取范式的形式存在。”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的变迁依赖于社会文化和规则资源的变迁和民众思维形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而“话语群—行为”模式则是研究社会制度中社会规则的转换,重点关注形式和内容的转变。因此对制度和结构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宏观和微观综合研究社会变迁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谭必友. 古村社会变迁: 一个话语群的分析试验[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 [2] H. 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农民的终结[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杜红艳]